



1 成为通讯员,我对跳伞塔产生兴趣

20世纪70年代末,大陆对台工作发生变化,成立不久的重庆市对台办,急需开展对台对外宣传工作。

我成为市对台办的通讯员,开始写一些统战外宣需要的文史题材和人物专访。尽管已进入社会新时期,但所有对台对外稿件仍需要进行严格审查。

当时没有电脑,只能是手写。稿件完成,填写审查表,交到市有关部门审查。审查表填写作者姓名、工作单位、政治面貌等,然后盖上审查单位的印章再发出。

使用这些稿件的有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、《羊城晚报》海外版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、福建前线《海峡之声》广播电台等。海外华文报刊主要是面向各大洲侨胞、海外华人的中文报刊。这些报刊使用的稿件,统一由中国新闻社发出。

通讯员写的稿件经过审查,发到中国新闻社。如果采用,就将通讯员用横排简体字书写的稿件,交给专门负责誊写的人,改用繁体字竖排誊写。有时候也会将繁体字竖排誊写的复写稿件,发回供稿单位,转给作者留存。

1985年,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,我写了《陈立夫与陪都跳伞塔》。当年,我偶然听到一位回渝探亲的老华侨提到,位于重庆两路口的跳伞塔,是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亚洲第一座跳伞塔。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,位于两路口的跳伞塔,也是我从小就十分熟悉的建筑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只要是风和日丽的晴天,就会有不少青年在这里跳伞。我小时候就曾经到两路口,趴在跳伞塔草坪外的铁栏杆上,观看年轻人在这里进行跳伞训练。

当时,参加跳伞的年轻人,集结在跳伞塔的草坪上,跳伞塔三角形钢架降下来,把穿戴好训练装备的青年,牵引到塔顶,用钢绳吊上去,然后再放下来。

经过反复训练,当钢绳把降落伞和伞下的人,吊到钢架顶端后,跳伞的人就可以自己拉开吊环的开关跳伞,或选择自动触发跳伞。

降落伞离开塔顶钢架,缓缓落下,五颜六色的降落伞,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,在蓝天中绽放,跳伞员如神仙从天而降,煞是好看。

每当看到大哥哥、大姐姐们跳伞,伞花在蓝天中盛开,年少的我,感觉是一种莫大的享受。其乐趣,不亚于现在的青少年观看体育比赛实况转播的感受。

2 为轰炸日本,建“亚洲第一”跳伞塔

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,家乡的这座显得陈旧落伍的建筑,竟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,不但是中国第一,而且是亚洲第一的混凝土跳伞塔!

为了解当年修建跳伞塔的情况,我到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查找资料。这个资料部,是国内保存民国、特别是重庆抗战时期报刊最齐全的地方。当年《中央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新民报》等报纸,对跳伞塔的筹备、建设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报道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国民政府西迁重庆,重庆迅速发展成为战时大后方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因此,重庆也就成为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的首要目标。

中国空军经过与日本侵略者多次会战厮杀,损失惨重。1940年,中国空军飞机只剩下100余架,驻守重庆的空军仅占四分之一,防空力量十分薄弱。因而,在重庆组建伞兵部队,加强空军建设成为紧迫的任务。

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,国民政府在顽强抵抗的同时,已经在准备组建中国自己的伞兵部队,培养滑翔机驾驶员,准备反攻时,轰炸日本本土。因此,国民政府决定修建这座混凝土跳伞塔。

1941年4月4日,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滑翔总会(各省设分会),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任常务理事,负责筹建跳伞塔。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,陈立夫筹集资金50万元,聘请我国著名建筑家杨廷宝先生设计,于1942年初,建成了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亚洲第一的跳伞塔。为纪念跳伞塔落成盛典,陈立夫题写了《陪都跳伞塔记》。镌刻于石碑上,竖立于跳伞塔下,以资纪念。

1942年4月4日,我国第一座跳伞塔在重庆两路口建成,并隆重地举行了庆祝跳伞塔落成暨开塔典礼。

落成典礼与中国滑翔总会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于当天下午3时在两路口合并举行,到会的有贺耀祖、白崇禧、张治中、谷正纲、于右任等500余人。

贺耀祖、白崇禧致辞后,行开塔礼。陈立夫在军乐声中把跳伞塔门的钥匙交给于右任。于老先生健步上前,打开跳伞塔的大门,回首振臂高呼:“塔门已经开了,全国青年上去吧!”

在群情振奋,掌声雷动中,陈立夫率先进入塔内,登上顶端平台,首批上塔人员从上面扔下许多木制滑翔机模型,以及许多五颜六色的小降落伞以庆祝跳伞塔落成。正好当天是民国时的儿童节,小孩子们欢呼,追逐,场面十分热烈。

3 四处搜寻,我发现跳伞塔石碑下落

重庆跳伞塔的建成,开创了我国跳伞运动先河,推动了跳伞运动的开展。当时,在重庆甚至掀起了一股跳伞运动热。

据重庆《大公报》报道,从1942年4月到1946年10月止,参加跳伞的人数达七万六千多人。

掌握了历史资料,接下来就需采访相关单位。于是,我用市对台办的介绍信去市体委采访。体委的接待者十

我在两路口体育场附近

发现一块珍贵石碑

这块《陪都跳伞塔记》石碑系重要抗战文物,目前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

□李中石

作为20世纪重庆最重要的抗战遗迹,位于两路口的跳伞塔与抗战胜利记功碑(即现在的解放碑),同样是一个时代和精神的象征,是重庆抗战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。

它像一个誓言直刺苍穹,展示着重庆人民“毋惧日寇,抗战到底”的决心和英姿。

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二楼,陈列的《陪都跳伞塔记》石碑,就记载了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,国民政府修建跳伞塔,训练滑翔机驾驶员和伞兵,准备反攻日本的历史事实,是十分珍贵的抗战文物。这块石碑收藏入博物馆,跟我多少有点关系。



1942年4月建成的重庆跳伞塔,是当时亚洲一流的跳伞塔。



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的《陪都跳伞塔记》石碑

分热情,介绍称1954年重新恢复了跳伞塔跳伞活动后,培训出王素珍、赵成英等22名优秀运动员,其中有12人先后打破十项十二次飞机跳伞世界纪录。这些纪录和成绩,他们如数家珍,一一道来,自豪之情,溢于言表。

但问起陈立夫和这座建筑的关系,他们大多表示“并不了解”。我又打探陈立夫题刻的石碑,他们称,石碑已被推倒扔掉,不知下落。

当时我想,这块一米多长、60多厘米宽的石碑,应该有一二百斤重,一般人是搬不动的,即使砸断也不会丢得太远。我心有不甘,于是决定自己直接到跳伞塔现场和附近去寻找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在距跳伞塔不远处的体育场墙外家属区,一个自来水龙头处洗手时有了重大收获。我发现在水龙头旁边,用砖头搭建了一个放置洗衣盆的洗衣台,这个洗衣台板不是用的水泥预制板,而是放置了一块光滑的石板,大小与当年报纸上记载的石碑尺寸差不多。

第二天,我又带上电筒重返现场,对这块石板背面进行详细检查,这才发现石板上面是平的,朝下的背面阴刻有一些模糊的文字。这块石板,应该就是陈立夫题写的《陪都跳伞塔记》石碑!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正是由于石碑被当成洗衣台石板使用,当年幸运躲过被砸烂一劫,才得以幸存。

4 反复研读,我为碑文断句和标点

随后,我赶紧将这一情况向当时的重庆市博物馆反映。博物馆方面十分重视,很快将石碑收藏入馆,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珍贵的历史文物进行保存。

石碑上的文字部分已经模糊不清,为完整介绍这一文物,我在1942年4月5日的《新民报》副刊上,找到了石碑全文。但原文没有断句、标点,在反复研读后,我对碑文作了断句和标点。

碑文为:“孙子曰: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。斯言也,自有空军降落伞兵种,而邻于事,实储经武卫国之能者,所不可勿也。本会用是创建跳伞塔于陪都,以谋普及此新战术之基本训练,且以激励国民之志气。他日风行四方,鹰扬八表,庶以此为轡也。陈立夫敬书 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四日立”

不过,我详细考证后写成的稿件,送审时却出了点麻烦。有人提出,陈立夫是著名特务头子,又是“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,宣传他不合适”。我当时30多岁,年轻气盛,据理力争。我认为经过拨乱反正,提倡实事求是,应该尊重历史,尊重事实。后经领导商定,稿件得以发出,由中国新闻社最后来决定如何处理。没想到,稿件引起了中国新闻社的重视,建议我从不同的角度,将原稿改写成两篇。

那时,还没有所谓著作权一说,中国新闻社将我写的《陪都跳伞塔》,改为用当事人第一人称的回忆,作者署名“周简段”,发表在《美洲华侨日报》的《京华感旧录》专栏;而另一篇《陈立夫与陪都跳伞塔》,仍然由我署名,在《美洲》、《欧洲》的几家华文报刊发表。

后来,陈立夫先生的亲属回渝探亲时,谈到他们曾经将《陪都跳伞塔》和《陈立夫与陪都跳伞塔》两篇文章,读给年事已高的陈立夫听。陈立夫听后十分激动,老泪纵横。听到这样的回馈,我为自己能够对当时还没有解冻的两岸关系起到一点推动作用,而感到十分欣慰。

(作者系文史爱好者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重庆跳伞塔被列入保护文物